读史札记

《中俄尼布楚条约》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

孙 喆

制作和使用地图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李约瑟曾指出:“在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当欧洲人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正稳步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这是一种虽然并非严格按照天文图的原则,但力求尽可能做到定量和精确的制图传统。”①中国建立大地坐标系统的实测地图萌芽于西方测量技术传入的明代,实际始于清康乾年间。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即使对道远路阻的西藏地区也派专员前往,历十年之久制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这不仅是中国,亦是世界上第一次运用近代制图学方法进行的全国性测量,规模之大、测量之精确令西方国家叹服。这件伟大作品的完成,主要依赖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清廷,确切地说是康熙帝,一是西方耶稣会士。而促使二者联手进行此事的契机则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地图功能的限定有极大的渊源。

何谓“地图”? 根据《辞源》的解释,地图“是反映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行政区划等所绘制的图。”《周礼 ·地官 ·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今天地图的功能可谓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其中社会功能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但从古代中国地图的制作上看,其行政功能,即地图的政治属性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中国制图术的大部分历史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统治者及遴选出来各司其职以辅佐其统治者的学者型官僚阶级的机构和实践活动。”②从清初制图活动的实践来看,一般都是在清廷的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地图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中国人对版图的理解是“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③。人口和土地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二者密不可分,地图反映了国家对二者控制的结果。

一提起清朝的地理勘测和地图的绘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耶稣会士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早在清军入关后不久,清廷即下令对全国进行广泛的土地勘测,这次调查活动是清廷在清初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的背景下,为巩固自己在中原的统治而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以地图的形式出现。满洲入关后,满洲贵族所面临的一个最重大课题就是如何稳定和扩大自己对中原的统治。满洲人口充其量不过占帝国总人口的 2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④但统治区域却差不多是原来的 20 倍。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拉拢汉族士绅,吸取汉族传统文化,照顾百姓生计,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等政策,试图以此来削弱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隔阂。与此同时,可靠的地理

[收稿日期]2002 - 8 - 20
[作者简介]孙喆(1971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北京 100872

信息对维持和扩大政治统治是极端必要的，满洲贵族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入关后，他们除了依靠明朝留下的地理文献，如地图、土地户籍册等了解全国情况外，自己也开始主持一些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工作。

此次调查以整顿赋役制度为发端。清初沿袭明制，以田赋、丁役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但明末以来户口土地册籍多毁于战火，重建工作便被提上日程。顺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646年6月9日)谕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于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特遣大学士冯铨、户部尚书公英俄尔代察核钱粮，在京各衙门钱粮款项数目原额若干？现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直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现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京责成各主管衙门，在地方责成按抚，严格而详细加以察核，编纂《赋役全书》。[5]

在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和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中原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康熙二十四年(1685)，根据新的情况，编成《简明赋役全书》。同时，继承元以来"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疆理无外之大"[6]的传统，开始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一统志》中所包含的地图是用传统方法绘制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绘制地图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使没有耶稣会士的出现，清廷也会绘制出自己的地图。那么，康熙帝为什么又要任用耶稣会士来绘制全国的地图呢？答案当然不排除康熙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欣赏，在中国历代所有君主中，康熙帝的这种爱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耶稣会士抓住了一个关键的时机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这个关键的时机就是康熙朝中俄之间的边界谈判。

17世纪以前，欧亚大陆各个国家的统治者们对他们所统治的地域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概念。而在17世纪，由于相互联系的结果，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国家都通过谈判划定了明确的、线状的边界。[7]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在清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天下"，即古代把家、国、天下连称，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得"天下"即实现了"大一统"，这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自康熙朝起，笼统而模糊的"天下"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即清朝四边的疆域范围渐渐被明确下来。与俄国的接触是造成这种改变的首要原因。

中俄之间的接触是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结果。15世纪末16世纪初，经过伊万三世(Ivan Ⅲ)及其子瓦西里三世(Vassilieff Ⅲ)的苦心经营，莫斯科大公国摆脱了蒙古钦察汗国的控制，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沙皇俄国开始急剧向东扩张，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17世纪中叶，俄国势力进入勒拿河，1632年在勒拿河中游建立雅库次克城，成为以后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据点。当俄国向黑龙江流域扩张势力的时候，刚刚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已经在黑龙江流域各部族之间建立起牢固的统治，于是中俄势力开始在这里交锋。[8]

康熙初年，由于中原地区尚未稳定，所以清廷无暇北顾。俄国在这段时期内也因与波兰战事正紧等而无力东顾。因此，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前，中俄双方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以和为主，俄国为打通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曾三次派遣使团来到北京。康熙九年(1670)米洛瓦诺夫出使中国前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促使康熙帝决心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的直接动因。

米洛瓦诺夫的出使，主要是由根特木尔叛逃事件引起的。根特木尔原是达呼尔族的一个酋长，驻牧在尼布楚附近，当俄国人进入贝加尔湖和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时，根特木尔不堪俄国人的侵掠，遂率族人于顺治十年(1653)越过额尔古纳河向南，进入清廷控制下的索伦部居住下来。清廷对根特木尔非常重视，据记载："根特木尔原是博格达皇帝的四品官，是一位执政王公，在中国每年领取薪俸一千二百两白银和六盒黄金。根特木尔统率着军队，博格达皇帝曾委任他为一特种团队的'红统领'，随皇上的兄长一同去攻打呼玛尔堡的俄国人。"[9]但于康熙六年(1667)根特木尔突然率领子女及部众共三百余人叛逃到俄境，在阿穆尔河畔居住下来。清廷为此同俄国展开了近二十年的交涉。

根特木尔为何离开清廷的管辖范围而来到俄国的控制区域？是因为"见到俄国人生活方式较好，内心颇为羡慕，遂回避同俄国人交战，

有意为沙皇陛下效劳”[10]呢？还是仅仅想重归故里？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着重要探讨的是从根特木尔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国家为控制人口流动所作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最终使封建统治者意识到划定边界，并以地图的形式标示出来是解决两国土地、人口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

从古至今，世界各国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均保持高度的警惕。人口自由流动所包含的隐患，如赋税的流失、兵源的不稳定、对犯罪行为治理不利等，对一个政权都有着致命的危害。尤其在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里，稳定的人口更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不光是赋税、兵役的主要源泉，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本保证。中国各个朝代为了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都采取了严格措施抑制人口流动。

根特木尔最初归附清廷时，他所属的部众被编制为三个佐领，清廷以自己的方式对该部人口进行了监控。从对史料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逃人问题在清初中俄外交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俄两国在签定边界条约以前，对毗邻土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通过对当地部族的控制取得的，即如果一个部族归附于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也就等于拥有了这个部族所居住的土地。在黑龙江流域生活的一些部族，像索伦、赫哲、费牙喀等很早就已归附清廷，成为清廷北方疆域的一道自然屏障。在中俄两大势力对峙的时候，处于二者之间的各个部族已失去了自由迁徙的可能性，它们只能选择一方。所以，根特木尔迁离清廷所控制的区域，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等于选择了投奔俄国这条道路。而根特木尔逃亡俄国，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的出逃，意味着他下辖的三个佐领的人众会追随他而去；尤为重要的是，将为周围各部族树立一个叛逃的榜样，使得人心动摇，当不满意于清廷时，会举而投奔俄国，寻求庇佑，从而使得清朝的实际控制领域将不断面临着麻烦。故清廷对此事件极为重视，而俄国拒不遣回根特木尔，并格外优待这个小人物，用意自然也在于此。而根特木尔事件也使得康熙帝意识到俄国东进步伐的迅猛，及从根本上遏制这一态势的必要性。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在致沙皇伊凡和彼得的信中说：“有关根特木尔一事，据达尼尔(即阿尔申斯基，涅尔琴斯克俄国官员)称已奏报察罕汗，一旦指令下达，彼当立即交出，决不延误；至于盘踞雅克萨城之尼基福尔等人伤害我方库楚鲁达呼尔居民问题，据该统领称，已逮捕十名罪犯押送京城，其罪行亦已书面呈奏察罕汗，现正待命处理。朕自获悉上述种种后，方始了解我国边陲地区与俄国毗连……但迄今未见尔对朕之谕旨作出答复，亦未将我逃人根特木尔归还我方或不再庇护，尔方人员仍一如既往肆意侵扰我国边民……我方军民当即攻克雅克萨城……尔国使节米起佛尔魏牛高(即尼基福尔 维纽科夫)抵此间，报知尔之钦差正兼程前来，业已离此不远，并带有书信，乞朕准予双方举行和谈，以划定边界；朕获悉后，当即遣使传旨，令我官兵解雅克萨之围，并停止一切攻战，以期于尔国大臣抵达后，议定疆界，树立界标，借以确保两国彼此和好。”[11]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在处理逃人问题上有了明确的依据，各自加强了对人口的控制能力。

在中俄谈判期间，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和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ion)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有过同西方国家订立国际协定的经验。徐日升曾有过以下的描述：“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在帝国里从未接待过贡使以外的外国人。鞑靼人(即在四十六年以前的1644年占领了中国的满洲人)对于世界情况一无所知，但却有着和中国人一样的自大感，把其他民族都看做像他们的四邻民族一样的牧民。他们以为一切都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他们高傲地把中国称为‘天下’，好像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12]而张诚“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与莫斯科人和解的方法。”[13]徐日升在他的日记屡次提到国际法，为中国人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康熙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要求徐日升一切都按国际法的原则办事。因此，他们在《尼布楚条约》签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对俄国人来说，他们是在汉学还几乎不存在的时代的最早的东方专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来说，他们是在中国人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的最早的西方专家”，而且，“他们是调停者和政治行动的参与者”。[14]

在中俄谈判期间及条约签定后的一段时间

内,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事业达到了最高峰。

两国之间边界的划定,往往要经历军事对抗、谈判、缔结条约、在地图上进行标示这样的步骤。按照历史传统,条约签订后,清廷必然会将新的疆域情况在地图上反映出来。清廷对关外地区的测绘,根据传教士的记载"在鞑靼地区,满洲人花了很大的力量精确地测量过"[15],说明在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以前,清廷已有了该地区的地图。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期间,清廷代表曾随身携带过一张地图以资考证。[16]但这些图无论在测量准确度或是所提供的地理信息上显然都是不够的,因为据说在谈判期间,为了解黑龙江流域的地理情况,康熙帝命进有关地图呈览。张诚把一张早已绘好的亚洲地图呈上,并指图说明中国的东北部分地区,因地理知识缺乏无法绘制,请求皇帝进行一次全国大地测量。康熙帝认为很有必要。[17]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习惯了和周边的部族、政权处于一种朝贡关系之中,满洲入主中原后,也继承了这种体系。沙俄势力的东进,中俄两国之间的谈判及《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破坏了这一体系的完整性,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新出现的条约关系必然使康熙帝以往的疆域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从而渴望对清朝的版图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了解,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的突出表现,使得他像信任西方历法一样开始重视他们的制图学。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巡幸多伦诺尔;三十五年(1696)亲征噶尔丹;三十六年(1697)北巡张家口、大同和宁夏;三十八年(1699)南巡,张诚和徐日升二人皆扈驾,讲解西方科学技术,并用西法不断进行实地测量。如三十五年在亲征噶尔丹途中,康熙帝对独石口和喀伦之间的情况进行了测量,"自独石口至喀伦,以绳量之有八百里,较向日行人所量之数日见短少。自京师至独石口为路甚近,约计不过四百二十三里……喀伦地方用仪器测验北极高度,比京师高五度。以此度之,里数乃一千二百五十里……"[18]次年,在回军途经宁夏时,又记录了在宁夏测量的结果:"朕至此以仪器测验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今安多(Antonius Thomas)以法推算,言日食九分四十六秒,日食之日晴明,测验之,食九分三十几秒,并未至昏暗见星。自宁夏视之,京师在正东而微北。"[19]康熙四十三年(1704),谕大学士曰:"天之一度即地之二百里。但各省地里有以大尺量者,有以八寸小尺量者,画地理图稍有不合者,职此故也。"[20]

就像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记载的,"若干年来无论在皇宫、京外御苑、鞑靼地区,或是在其它地方,都经常可以看到皇帝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于天体观测与几何学的研究。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而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21]

通过亲自实地测量,康熙帝对西方制图学的方法和准确度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感到中国传统舆图绘制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即"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误差者多。"[22]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华传教,沿途细察各省地图,发现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地不符甚多,他将此事上奏给康熙皇帝,再次建议重新测绘全国各省地图,这就更坚定了康熙皇帝测绘全国省级新图的决心。[23]康熙帝命白晋返回法国,号召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不久,白晋挑选了十几个精通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及测量工作的传教士回到北京。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康熙帝对他们的工作做了一次检验。由于永定河(原称芦沟河或浑河)的周期性泛滥对京师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康熙帝认为有必要对顺天府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一次细致的勘测。康熙四十一年(1702),耶稣会士安多、白晋、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及巴多明受命去完成这项任务。经过七十天左右的工作,耶稣会士完成了地图,康熙帝对此很满意。接着,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又命令传教士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测量,正如杜赫德在他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中说的那样:"这个伟大的君主指派传教士绘制北京周围地区的地图,就是为了判断欧洲的测绘方法有多精确。"[24]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地图绘制成功,上呈给康熙帝,"帝亲自校勘,认为远胜

旧图。”㉕如此,试验取得了成功,随之在新方法指导下的全国性大地测量活动开始了。

综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刺激康熙帝采用西方制图术进行大地测量的关键。事实上,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双方都对接壤地区的勘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绘制出自己的全国性地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现在还存有几张 18 世纪的俄国地图。“就整个帝国、民族国家或者皇家领地这样的庞大地域来讲,小比例尺地图能使人们产生一种形象上的概观,甚至可以营造出一幅圣像般的王国样子来。”由于“科学地图似乎能给统治者提供一幅完美的‘全景监狱图’以助其修成统一大业”㉖,康熙帝认为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可能会使他更准确、更清楚地洞悉帝国版图,故在纂修《一统志》的同时,康熙帝又开始了另一项大工程,即绘制《皇舆全览图》。在康熙帝看来,这两项工程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明确满洲贵族在中原地区的正统地位,划定清朝的疆域范围。从地图最后被定名为“皇舆全览图”也可以看出康熙帝把整个帝国置于他的视野之内的愿望。整个绘图过程也是在服从康熙帝的这种政治目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动员相当大的力量对一些边疆地区,像黑龙江流域、西藏及中朝接界区域等进行测量,并将地图的测绘范围牢牢锁定在清廷政治、军事有效管辖范围内,西北地区的测量仅到哈密为止,以西当时由准噶尔控制的区域,及北部、东北部与俄罗斯毗邻的地区,在图上都没有做详细的标示,而是以大量空白的形式出现,这些都清楚表明了《皇舆全览图》绘制的政治目的。

①[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5 卷,地学,第 65—66 页,科学出版社,1976 年。

②Cordell D. K. Yee,“Chinese Maps In Political Culture”, In J. B. Harley,“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清史稿》卷 283。

④费正清等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 22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⑤《清世祖实录》卷 57。

⑥《秘书监志》卷 4,《纂修》。

⑦Peter C. Perdue,“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xx. 2: June 1998, pp. 253 - 504.

⑧参考孙维华、张西著:《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6 月。

⑨⑩[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第 1602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

⑪同上书第 1598—1601 页。

⑫[美]约瑟夫·塞比斯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 112—113 页,商务印书馆,1973 年。

⑬参见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拉雪兹神父的信(1703 年 2 月 15 日),载于[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 278 页,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⑭参见[美]约瑟夫·塞比斯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⑮[法]J. B. 杜赫德著,葛剑雄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载于《历史地理》,第二辑。

⑯该图据考是朗谈的《吉林九河图》,见吉田金一《朗谈<吉林九河图>和尼布楚条约》,转引自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3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⑰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方豪:《中西交通史》等都有这样的记载。

⑱《康熙御制文二集》卷 19。

⑲《康熙御制文二集》卷 24。

⑳《清圣祖圣训》卷 53。

㉑[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第 42 页,珠海出版社,1995 年。

㉒《清圣祖圣训》卷 52。

㉓转引自秦国经:《十八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载于《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㉔转引自 Theodore N. Foss,“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Jesuit Cartography”. In Charles Ronan and Bonnie Oh, eds.“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 - 1773”, pp. 22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㉕《清史稿》卷 283。

㉖James A. 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0, No. 2 (December 1999): 61—98, by the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